

【编者的话】

“恨爹不成刚，怨爸不双江。”，“我爸李双江，我有冲锋枪。”。

歌手少将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无照驾驶、动手打人且事后逃逸的事件，又给中国网民源源不断地创作段子提供了原料。然而，戏谑狂欢的表象背后，却是特权横行让这个社会品尝的深深苦涩。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之所以能够触及人们心中最敏感的地方，是因为特权阶层已成为中国之患。

本期一五一十周刊，以“特权阶层”为主题，分析其由来、表现，及隐患。



在开篇一文中，陶短房指出了李天一事件背后的社会意识，即广泛存在于社会公众心中的特权思想，他认为，这种意识比特权本身更值得警惕。

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是分析中国当代社会的经典书目，近日该书再版，他在接受访谈时结合当下社会阶层的新变化阐述了对中国社会阶层的观察，这种总览式的概括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权阶层在今日中国的位置。而杨鹏和方可成的文章则分别从经济特权和教育特权两个方面具体阐述了特权在今日中国的表现，可以作为微观考察的参照。

“特权阶层有害”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命题，但究竟为何有害，有何祸害，需要更为严谨的思考和论述。储成仿从一本名为《论特权》的经典小册子出发，阐述了“特权搞乱社会”的历史启示。他引用作者西耶斯的话说：“让我们设想一个组织得尽善尽美，无比幸福的社会；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这点不是很明显吗？”

最后，我们将从理论的警告转至两个活生生的例子——苏联的解体和汉朝的覆亡。这一中一外、一古一今的案例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动的道理：无法得到制约的特权阶层是一个政权的掘墓者。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案例，无不为今日的中国敲响了警钟。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　录


在 Google Buzz 分享本期周刊



【例】

7-1 陶短房：特权意识比特权本身更值得警惕



“包括你我在内，每一个痛恨特权、曾被特权损害过切身利益的人，一旦易位而处，又是否能抵御特权的诱惑？整个社会体系，又是否赋予特权过多显示威力的空间，而让平等、法治变得如凤毛麟角般稀罕？”

知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无照驾驶、动手打人且事后逃逸，目前已被刑拘，李双江也已到医院向伤者道歉。据媒体报道称，被李天一殴打者已表示“接受道歉，但坚持诉诸法律”，而李双江则表示“不参与处理”。

就案件本身看，至少表面上已无法再谈“特权”二字：肇事者李天一已被刑拘并即将接受法律惩处，原、被告也都作出尊重并静候法律裁决的姿态，尽管有人指出，“从宽处理”的风声业已悄然放出，但鉴于李天一年仅 15 岁，不具备完全法律责任能力，即便真的“从宽”了，也有其法律依据。

此次事件中，比特权更严重的，是始终弥漫的特权思想、特权意识。

李天一的交通肇事并未造成严重损失，且系未成年人，性质也不算严重，仅从案件本身看，似不应引起如此“轰动”，之所以“可气”，很大程度上是他喊出那句“谁敢打 110”，很显然，身为名人之子的他，已经在潜意识里将自己当成“特权人”，认为自己就应该享有超越常人的权利，出了纠纷自己要占上风，即便有错也可以有恃无恐。

从李双江夫妇事后的表现看，很难想象他们会主动灌输这种特权意识，李天一所上的几所中外名校，尽管教育方法、思路各异，但所遵循的，也无非教书育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传统套路，不但不会主动灌输特权意识，甚至会照本宣科地强调“人生而平等”，强调遵章守纪、遵纪守法的必要性、重要性。然而千次言传，不如一次榜样，现实中李天一四五岁就成了“年纪最小的申奥大使”，多次与父亲同台演出献歌，在中央民族乐团音乐厅开过“假日歌友会”，还曾替父亲领取过“十大孝子”等荣誉奖项……不难看出，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机会、荣耀，并非李天一凭个人天赋、努力或专长所能获得、享受，而是沾了“李双江儿子”的光。不论他们父子是

否认账，是否意识到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特权红利，事实上就是“李双江儿子”比常人更有机会、办法和“路子”，可以趋利避祸。这种“方便”只要成功一次，就足以抵消学校、家庭和社会一百句、一千句的“平等”、“守法”灌输，何况远不止一次？

特权本身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法律严肃一点，公众认真一点，就可以让特权受到挫折。即以此案来说，高喊“谁敢打 110”的李天一等，当围观者真打了 110、110 真的到场，却登时惊惶失措、仓皇逃走，且怕人打 110 本身，也实际上反映出其心虚的一面。

然而特权意识却比特权更加顽固，尚未成年的李天一受此教训，能否痛定思痛；其痛定思痛的结果，是认识到特权意识大错特错，还是认为自己父子的“牌子”还不够大、面子还不够足，甚至坚信此次吃亏的结果，不是法律的胜利，公众、舆论的监督，而是“小特权输给大特权”，又有谁能说得清？倘若特权受挫不过偶然，特权沾光却是常态，后果如何，那就不言自明了。

李天一是未成年人，作为监护人的李双江应负督导之责。今天我们在旧报道、旧网文上，找到的是清一色赞许、褒扬，虽然此时翻这些旧账未必公平，且“瘌痢头儿子也是自己的好”，舐犊之情，也可以理解，但严是爱，松是害，一味给爱子提供各种便利，却不注重培养其自重、自尊、自强的性格与品质，谁能说，儿子的特权意识，做父亲的就不该负责？李天一只有 15 岁，照理连拥有驾照的资格都没有，但做父亲的不但亲手教开车，出巨资帮忙改装车，且任由其无照上路，父亲尚且如此，又怎能指望儿子尊重法律、遵守规章？事发后，李双江登门道歉，表示绝不袒护，这本身固然很好，但“不参与处理”5 个字本身，又何尝不带有特权意识的残余？此事已经提交司法处理，即便是名人、父母，又凭什么“参与处理”呢？

不但李家父子，社会、舆论、公众，心中是否多少也会有些特权意识？李天一身份未明时的联想和人肉搜索，知道其身份后不顾其未成年的穷追不舍与“合理推想”，是否多少也带有“名人必定有特权”的想法？包括你我在内，每一个痛恨特权、曾被特权损害过切身利益的人，一旦易位而处，又是否能抵御特权的诱惑？整个社会体系，又是否赋予特权过多显示威力的空间，而让平等、法治变得如凤毛麟角般稀罕？

特权值得警惕，但更值得警惕的，是特权意识和特权思想；倘若特权意识、特权思想无所发威，所谓特权，就不过是纸糊老虎，一触即溃罢了。

（陶短房，旅加学者。原文链接：
http://gcontent.oeeee.com/0/e0/0e087ec55dcbe7b2/Blog/7c5/bd674e.html）



【返回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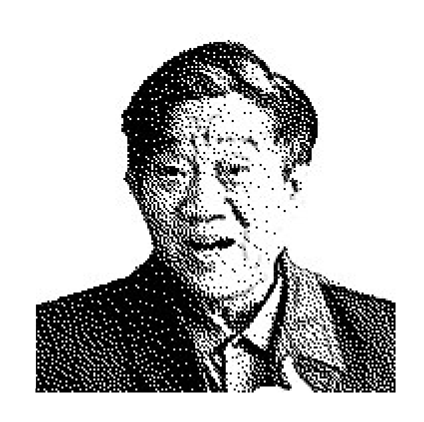


【观】

7-2 石剑峰：杨继绳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改革头十年，通过个人努力是可以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提升的，也就是后赋性流动比较多。到 1990 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的比重在加大，如果从上到下都是官二代、富二代，社会阶层就会固化，下层就没有希望。”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不久前再次修订出版，在这本书中，杨继绳引入这几年新的社会事件材料，对中国当代社会阶层进行分析。他从经济财富等方面把中国当代社会视为五个阶层，然后对各个阶层内的社会群体做历史分析，分析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间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变化，尤其是他们掌握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变化，由此分析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杨继绳表达的只是一家之言、一种分析方法，但他在本书中所作的分析研究主要利用了公开发表的统计资料。

在杨继绳看来，社会是否和谐，关键因素之一是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他希望通过各个社会阶层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国情，分析各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未来的变化，杨继绳表示乐观。

杨继绳，原新华社高级记者，2001 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的编委、顾问和副社长等职。

石剑峰：在《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您的做法跟一般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有什么区别？

杨继绳：社会有多个阶层，这是客观存在，官方对此也在进行分析研究。社会学家在分析阶层的时候，先找几个点做长期的测量、研究，然后再推向社会全局。这需要花很多时间和资

金，我没有能力去做长期调研，也没有那么多人手，所以只好利用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或者没有公开发表但有权威性的资料进行分析，这些资料来自社科院、国家各统计部门、行业协会、全国总工会等。我这本书每修订一次，就会根据相关资料做修改。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研究某个社会阶层层面的变化，我其实写的是历史。

这里的历史有几个意思：一个就是改革前后的历史，也就是改革前后阶层分层标准的变化，改革开放前我们是怎么分层分阶级的，现在又发生了什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前，我们社会分层的标准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我写的是，这些阶层改革前怎么样，改革后怎么样，每个阶层的历史变化，比如改革前的工人状况如何，中间怎么变化的，现在情况怎么样；农民改革前怎么样，中间怎么变化的，现在怎么样。所以说这不是一本社会学著作，是一本历史著作。

也就是说，我要研究的是，每个阶层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发生的变化。我虽然不是专业的社会学学者，但是我用材料的时候，还是按专业学者的研究方法去做。

石剑峰：您把中国社会分作五个阶层，依据是什么？这些阶层显示出什么特点？

杨继绳：我把中国当代社会分成五个阶层，如果我们抽象地看这五个阶层，其实只是一个符号系统，没有太大意义，要看里面的具体内容。在我的划分中主要考虑到了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财富状况，再参考声望等因素。

我以 2008 年全国经济活动人口 7.9243 亿人来划分，第一个阶层主要集中在银行、大型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垄断企业、大中型私有企业领导层之中。第二个阶层为高级知识分子、中高层干部、国家和省属事业单位中高级管理人员、中型企业经理和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中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垄断行业的白领职员和资深蓝领。这个阶层对一般人来说，就是成功的象征。第三个阶层具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掌握并提供市场需要的职业技能。这个阶层存在着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也有着向下流动的可能。第四个阶层主要是由农民、工人、农民工，也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构成，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太多。最后一个阶层主要是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这个阶层没有固定收入，向上流动更难。

从我的划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当前的阶层特点就是，80%的经济活动人口在经济财富上处于社会中下，这是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农民收入低、负担重、存在干群矛盾。工人收入低一是历史造成的，另一个原因是承担了改革成本，比如下岗。最近几年，劳动收入

占 GDP 比重又不断下降。农民工则承担了最苦、最累、最脏的劳动，又很难得到城市人口的待遇。中下阶层过大也就意味着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由此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受到限制。第三个特点是高阶层的财富获得的不透明，所以社会对他们并没有完全认同。

关于各个阶层的具体人数与比例，《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中国社会从经济等方面而言现在是金字塔形，如果在下面的多数人都想往上走，这个社会就不容易安定。

石剑峰：您认为各个阶层，以及各个阶层里的社会群体，他们有对自己所处地位的认同吗？

杨继绳：我认为他们会有自觉意识。比如我们知识分子、工人等就有很强的自觉意识，私有企业主阶层也有一定自我认同，但是中等阶层不一样，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上不下，认同问题比较大。从我们的调查看，工人对本阶层有归属感，与此同时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也开始增多。总的来看，各个阶层都在为自身利益表达意见：工人要求保护自身利益、私有企业主要保护私有财产、知识分子要求更宽松的环境、农民要减轻负担等，但这些自觉意识并不表明他们有了阶级意识。

但如果垄断不破除，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低收入者居住集中，群体性事件更加频繁，这会加速共同意识的发展，强化阶层冲突并提高其阶层自觉性。

石剑峰：相对比较来看，有些群体的经济地位、生活水平是相对下降的。

杨继绳：是这样。工人和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在下降的，但这么说也是相对的，绝对情况还是上升的。比如农民、工人都能吃饱饭，工人住房比过去改善一点，自由度也提高了。农民以前不能到城里来，现在能到城市自由打工。但是与其他群体的相对落差还是很大的。我曾说过，幸福是一种个人感受，这种感受跟信息量有关系，封闭的信息量小，我觉得我已经很好了，知道别人比我更好就感到不幸。

石剑峰：其实这就涉及尊严问题，而不仅仅是社会财富和权利的问题。

杨继绳：尊严是和权利连在一起的，没有权利就没有尊严，而权利跟民主是连在一起的。在以往高度集中的政治环境下，是缺少权利的。所以首先做一个公民，公民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石剑峰：与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特点相对应的是社会流动，它呈现出什么特点？

杨继绳：首先我要肯定，社会流动是合理的。社会流动是人往高处走，每个人都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流动使每个人变得更有希望，所以社会流动是保证社会安定、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方式。改革头十年，通过个人努力是可以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提升的，也就是后赋性流动比较多。到后来 1990 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的比重在加大，如果从上到下都是官二代、富二代，社会阶层就会固化，下层就没有希望。

以前还有读书，如果连读书也不行了，这就比较可怕。社会固化是很重要、很危险的问题。造成社会固化的原因很多，主要是行政权力不受制约，行政权、审批权成为宝贵资源，户籍制度依然存在，城乡间教育不公平，以及一些就业岗位出现体内循环现象。这些都对健康的社会流动产生非常严重的阻塞作用。

石剑峰：三十多年来，社会各个阶层的流动、变化都很大，比如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在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当下，您比较担忧的是什么？

杨继绳：我最担忧的是收入和贫富差距过大。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为什么是和谐，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有不和谐的因素存在，所以才及时的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不单是靠一个阶层的人和谐，不单是个人的和谐，也是各个阶层间的和谐。

但客观来说，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地位不同，诉求不同，愿望不同，他们的利益占有方式不同，所以肯定有矛盾。阶层之间有矛盾，有差异，所以不和谐也体现在阶层之间的不和谐。阶层之间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公平和公正某种程度上的缺失。社会公平和公正是阶层和谐的一个基础，所以我在书里说，要在社会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怎么减少阶层摩擦，怎么减少阶层争斗，怎么减少阶层矛盾，让各个阶层之间更加和谐，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说我要挑起阶层矛盾，不是那么回事。我都是从历史来分析的。

我一直在外面讲，中国当下存在两种矛盾，一个矛盾是干群矛盾，第二大矛盾是劳资矛盾。干群矛盾的背后是权力缺乏充分的制约，劳资矛盾的背后是资本缺乏充分的驾驭。我提出自由权利驾驭资本，是从阶层分析得出这个结论来的，要自由权利驾驭资本，当然要通过整改。

石剑峰：您针对各个阶层提到的这些忧虑反映到社会上来，会引发哪些社会问题，由此会造成何种社会矛盾？在您看来，哪些矛盾是当下最需要得到重视的？



杨继绳：阶层之间存在的问题可能产生一系列冲突，首先是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发的劳资冲突。第二个是因土地和移民问题而引发的冲突，这是当前社会群体性事件中最引人关注的地方。围绕土地补偿和失地农民安置，容易引起矛盾，甚至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第三个是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的对峙，这些强势群体虽然未必属于社会上层，但在有些农村，他们和农民的矛盾不小。由于社会基层政权在某些地方受制于强势群体，所以这两个群体的矛盾也就体现为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关系复杂。这个矛盾相对最尖锐，还夹杂着土地、资本、宗族等因素。第四个危险点是群众对腐败的不满，除了官员腐败引起群众不满，还有为富不仁引起群众不满，所以也就产生仇富和仇官心理。与某些干部的腐败和资本的为富不仁相对应的是产业工人下岗和农民贫困、大学生就业困难。

在如今的社会结构中，各个阶层之间缺乏缓冲的中间地带，容易形成社会的二元对立。现在还呈现的一个趋势是，相当一部分对现实不满的人群集中在城市，一旦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就会难以控制。如果城市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很容易蔓延，其危险高于农村群体性事件。

石剑峰：所以在您看来，哪些社会体制以及相关架构需要顺应社会的变化改变？

杨继绳：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比以前多，这是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社会矛盾的体现，引起公众的不安全感。但现在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还是孤立事件，没有呼应，否则就比较麻烦。由此，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安全机制必须转变。我们必须确立新的社会稳定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是控制，而是协调和规范。要建立沟通渠道，让各种意见得到表达。要培育中间组织，建立风险和冲突的缓冲，等等。

其中我最想讲的是，必须制衡权力、驾驭资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从完全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主要依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中国的两种矛盾，劳资矛盾和干群矛盾，其实是针对权力和资本。所以今后改革的任务就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在这一方面，可以参考借鉴人类几百年来探索出来的成功经验。

石剑峰：对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未来的变化，有什么推断？您对此是乐观还是悲观？

杨继绳：尽管有很多忧虑，我还是比较乐观地认为在未来，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会不断扩大，低层阶层会缩小，社会逐渐成为橄榄形结构。政府权力会减少，政府职能减少，社会权力、中介结构和组织地位上升。各个群体之间地位上升下降依然会存在。

（杨继绳，新华社原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石剑峰，东方早报首席文化记者。原文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9/11/663767.shtml）



【返回目录】

7-3 杨鹏：中国的"特权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自古皆有，东西方都一样。东西方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近现代解决了政治特权这个问题。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不在于有没有市场经济，就在于是否有政治特权这个标准上。"

（编按：此文根据杨鹏先生 2007 年 4 月 15 日在北京"中国的市场经济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特权市场经济

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受到很多启发，但有些朋友的讨论偏离了今天的会议议题，我还是回到会议议题上来，即如何认识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特征？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我们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经验去形成判断。一想到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情况，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官僚的特权，这些特权既表现在法律之中，也表现在政策之中，更表现在官僚的个人意志之中。官僚的这些有形无形的特权，在极大地影响整个中国市场的运行状态。形成这样的判断，不是出于什么理论观念，而是出于正常的经验观察和体会。这样的经验事实，赤裸裸地摆在我们每个人前面，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概念去准确描述呢？吴敬琏先生曾将这种状态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意思就是官僚权力支配下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所指的大意是清楚的，说我们虽然有了资本的力量，但官僚权力对资本运行有很大的影响。但细想起来，选用的概念还不算太准确。为什么呢？"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为本的主义"，这在中国还没有实现，中国还谈不上真正进入了"资本主义"。"权贵"这个概念中，"权"指有权力的官僚，但"贵"指什么呢？在过去，"贵"指的是贵族，有爵位的，血缘贵族或军功贵族。在西方，"贵族"这个概念，不仅指其地位高，似乎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或气质的特点。而贵族作为一个有血缘、军功或文化的历史传承的群体，在中国似乎并不存在。中国没有贵族，那些官僚，似乎难以与"贵族"这个概念统一起来。所以，"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我认同吴老想说的意思，但还是觉得这个概念的抽取还不算太准确。吴思老师是概念抽取的高手，他抽取过"潜规则"和"血酬"等重要概念。最近他在不同场合谈"官家主义"，他认为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是官说了算的"官家主



义”。如果用“官家主义”来概括今天中国的现实，似乎也不是很妥当，毕竟中国还是有了资本，有了自由交换的市场，有了全球化的开放经济，官权仍然很厉害，但也并不能为所欲为，受市场力量和规则的很大制约。看来，“权贵资本主义”也好，“官家主义”也好，在选用概念上都有一些不十分贴切的地方。什么提法才更好呢？我也没有想得太好。总之，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传统的政治特权与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纠结在一起，权力的坏东西和市场的坏东西合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坠落，权力的好的方面和市场的好的方面被压制了，共同难过。我们用什么更妥当的提法来描述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政治特权扭曲下的市场经济”，恐怕叫“特权市场经济”更妥当一些，病根就在“特权”两个字上。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更准确的提法。

我姑且先用“特权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要理解“特权市场经济”这种状态，我们就得有一个参照系，我先把“特权市场经济”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查看，看看到底是不是人类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特殊的现象。将“特权市场经济”放在人类或中国历史的参照系上，我发现它一点不特殊，并不是今天中国才有的特殊现象，而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外国不说，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它也一样是古已有之，而且还是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上的常态。

死人抓住活人

中国自秦朝建立以来，就进入了一个君主官僚的市场社会。君主官僚政治权力高度一元化，同时在经济领域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土地私有化并自由买卖，多数商品自由贸易流通。但在这个市场经济中，朝廷通过支持官营工商业，垄断了最有利润的经济行业或者经济行业中最有利润的环节。汉朝“文景之治”，是君主制下高度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经济。大家只要读读《史记》中的“贷殖列传”，可看出当时的工商业是多么的开放和自由竞争，而且私有财产并不受官僚随意侵夺。汉武帝上台后，转变了“文景之治”的“清静守法，无为而治”的国策，积极有为，开始兴办官营工商业，以行政暴力打压私营工商业，官商就垄断了盐铁等高利润行业。政治特权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一元化特权垄断，二是有利润行业的官商特权垄断。这么看来，今天中国社会的状态新鲜吗？一点不新鲜，与汉武帝时候有多大差别呢？我看不出来。如果说全球化与世界贸易，那时候也一样是开放的贸易。读读史书，我看到无论在政治结构还是经济结构上，我们今天与汉武帝时候没有多少差别。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无历史的社会”，并不是没有道理，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都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历史变化，所以真是“无历史”。

大家再想想，国民党当年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这是很新的概念，但在国民党治下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跟今天中国的差别似乎也不大。追求“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和追求“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打得你死我活，但最后哥俩却殊途同归，回到了政治一元化下的特权市场经济这条路上来。当然，要说中国“没有历史”也不完全对，毛泽东算是创造出了历史。或者说，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上出现的最大的变革是在毛泽东时代，他硬搞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跟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在经济结构上完全不同，如同中国历史忽然发病一样，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了，最后中国又回到秦制。毛泽东自己都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但放远一点看，毛泽东的历史创造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毛泽东搞的这一套结构，我怎么看都与周朝的经济制度没有多大区别。毛泽东一生骂儒家，最后又落到儒家的理想陷阱里去了。中国古人们留下的历史的模式，不管穿上什么新衣服，用什么新的称呼，里子仍然如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死人总是悄悄伸手牢牢抓住我们的心，有点恐怖吧！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最大的不满当然不是对市场经济本身的不满，而是对政治特权的不满。这个政治特权超越了市场自然秩序和规则，随时用暴力来划分市场格局，来强制分配资源，法律和政策，只是政治特权之手玩弄扭曲市场自然秩序的工具。这就是中国今天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也是二千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大家无论从那个角度的不满，其实都是对覆盖在市场之上的政治特权的不满。竞争不公平、司法不独立、没有工会、没有足够的转移支付来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所有这些毛病，归根到底就在“政治特权”这四个字上。从中国历史来看，“市场经济”自古就有，“政治特权”也是自古就有，“权贵资本主义”自古就有，“官家主义”自古就有，“政治特权扭曲下的市场经济”自古就有。有人说，中国过去没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保护，与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监督等等因素是相联的，其实这是今天人们心中理想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保护、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监督，这些东西，针对的对象就是政治特权。大家想要的是一个没有政治特权的市场经济。今天的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特权的问题。

有时候我感到很困惑，历史的精神就这么有力量？看到历史传统对百年来革命者们的无形的支配，我们要小心起来。我们今后要解决的，恐怕不仅是换一个宪法的文本这么简单，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宪法文本的改变，也需要支撑新文本的新的文化精神传统的建设。

曾锦春：特权市场经济的活标本



我今天带了一个报道，报道的是中共湖南郴州市原副书记及市纪委曾锦春凭手中的“双规”权力敛财的故事。曾锦春受贿 3000 万元，不明财产 5000 万元。他赚钱的办法是：1、他给企业发“私营企业重点保护单位”的铜牌，一个铜牌 40 万，你不交钱就“双规”你。2、控制矿山：借矿山安全整顿，把矿山抢到自己人手中，把不是自己人的“双规”或赶走。3、控制法院：决定经济案件的裁决，吃了原告吃被告。法官不听话，就把法官“双规”起来。4、控制行政：交通局、税务局、烟草局等行政机关的领导，不听话就“双规”起来。5、控制公共工程：市里的公共工程项目，他千方百计弄到自己人手上来干。

我还注意到，他把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共 40 多个人安排在政府各个要害部门，把政府办成了他们家族的私人合法暴力特权公司了。中国法家讲“尊尊”，是说要忠于皇帝。中国儒家讲“亲亲”，要照顾亲人。看来曾锦春是只讲“亲亲”不讲“尊尊”的。曾锦春直接用政治暴力和特权来抢夺市场和资源，把政治家族化，也把经济家族化了。这个最近才发生在湖南的故事，是否能多少说明一点我们今天的“特权市场经济”的特点呢？

在中国的古代皇权社会，政治权力是属于皇家的，政治所有权很清楚，政治权力是私有财产，家国一体。官僚不过是皇帝的经理人、代理人，官僚腐败，是在损害皇家的家国大业，皇家岂能容你？皇家当然要看好自己的私有政治权力。今天的制度下，公共权力是谁的？是主权在民吗？人民从来没有选举过自己的政治领导。官员都说自己是给党打工的，党是谁？只能说谁在台上那天，他就是党，不在台上，就不是党，党就是这个台了，这个台很抽象，没有人格化。谁会为这个台努力自觉地监督官僚们呢？动力严重不够。比起过去的皇权社会来说，维护政权整体的长远利益的动力机制严重不健全。过去的皇权制约死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约还没生出来，我们处在传统与未来之间的昏暗之中。

“特权市场经济”继续往下走，大家都会很清楚结局是什么样子。结局就是大大小小的曾锦春凭借政治特权，垄断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成为中国人民的黑暗主宰。乌有之乡左派们约我去辩论，我讲了“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风格完全是泼妇骂大街，其实没有多大意思，我们真正要关注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改革的前期好而改革的后期有问题？前期是对社会的放权让利，多数人得到福利。后期的改革就是曾锦春这一类特权官僚，他们借改革之名，以合法暴力之手，大规模介入到对市场财富的掠夺和控制上来，在政治和经济上形成特权垄断的家族力量。老百姓对近年来的改革的不满就是从这儿来的。老百姓不是恨市场经济，是恨扭曲市场经济的政治特权，是恨特权垄断与腐败。



职业平等的历史变革

前面说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特权的问题。我们如果要想无历史的中国成为有历史的中国，我们要改变的就是政治特权对中国人的控制和压迫。我们有一个理想中的市场经济，一个自由开放、公平竞争、宪政民主、司法独立、保护私有产权、拥有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这是多数人共同的愿望，这种愿望的实现，遇到的阻碍就是政治特权。而且，现在这个政治特权，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事，庞大的特权经济依靠在政治特权之上，特权政治与特权经济的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政治-经济特权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曾锦春与他们在权力部门的亲属及其经济上的各式代理人。政治特权生出经济特权，形成特权市场经济，特权市场经济生出特权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维护特权市场经济和特权政治权力，这就是中国的病根。面对这个无处不在的强大的特权利益集团，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谁能给我答案？

我有一个体会，中国今后的改革所面对的，是确定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合适范围。二千年以来，政治权力在中国至高无上，无所不覆盖，在毛老人家身上也是如此。一个社会，为什么会给吃政治饭的人那么大的权力和财富呢？政治只是一种职业，而且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既不搞科研，也不搞生产，不创造知识，也不生产财富，完全靠生产者和纳税人的贡献在生活。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要给政治工作者如此高的地位，让他们占有如此大比例的资源呢？纳税人供养他们，只是让他们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他们只是纳税人的公共事务代理人员而已。过去儒家说，政治工作者是天命所归，是上天派来当我们的君主和老师的，是我们天生的主子，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骗人的话。虽然我们知道政治工作者其实是没有生产性的，但我们还是给这些不生产的人好大的权力和财富，让他们不断把公共权力家族化，让他们不断把公共财富家族化。为什么？原因就是一条，我们是神经病，我们心智不正常。

市场经济自古皆有，东西方都一样。东西方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近现代解决了政治特权这个问题。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不在于有没有市场经济，就在于是否有政治特权这个标准上。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就是压缩了政治工作者的权力范围，清除了政治工作者的特权。什么叫言论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别人怎么说话。什么叫宗教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无权管宗教人士。什么叫出版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作家艺术家。什么叫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抢私人的财产。什么叫司法独立，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法律工作者。什么叫经济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干涉经济工作者。什么叫政治改革，就是不



吃政治饭的各种职业的人，不再受吃政治饭的人的气，不再由吃政治饭的人统治。所以，近现代的政治变革，本质上是一场职业地位的变革，是职业平等的变革，是从事生产性职业的人争来了与不从事生产性职业者的平等的权利。

职业平等运动，这么简单的概念，这可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政治权力从高空跌落，吃政治白饭的人从高空跌落，跌到人与人平等的地位，跌到职业平等的地位，吃政治白饭的人从主人变成公务员，政治权力从全面统治社会收缩到只能从事公共服务上来。

自由派与社民派

从长期看，未来中国的政治理论之争，只会在自由派与社民派之间。今天会上的朋友们是有分类的，一部分是社民派，一部分是自由派。现在面对"特权市场经济"，我们都被叫成了"右派"或"自由主义者"，其实我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今后民主政治转型任务完成后，社民派和自由派的分歧也就出现了，这是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底线上的左右翼，我们之间的竞争互动是建设性的。自由派无非更强调自由竞争与产出效率，社民派无非更强调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双方的差别最后主要表现在税收的高低差异上。前者代表竞争力强的人挣钱多的人，后者代表竞争力弱的挣钱少的人。两者的差别，是自由派对权力是警觉的，认为权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社民派对权力则多一些迷恋和信任。自由派与社民派，两者都有社会基础，因为社会就会有竞争力不同的人，竞争中有成有败，有成就大的与成就小的，总会分为不同的阶层，弱者要的是保障，强者要的是自由。

今天大家还在争吵经济学家的功与过，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经济学承担意识形态功能的时代已结束，现在法学开始承担这个功能。其实，无论那个学科扮演意识形态的至高角色，都是社会不正常的表现。今后各学科平等了，不同学科的从业者平等了，这个社会才正常。职业平等，就是人格平等，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平等是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也许这是神确定的方向。今天政治职业高于一切，成了特权职业，所以政治家与其他职业的人不平等，这就是我们政治改革着眼的方向，这就是我们的真正任务。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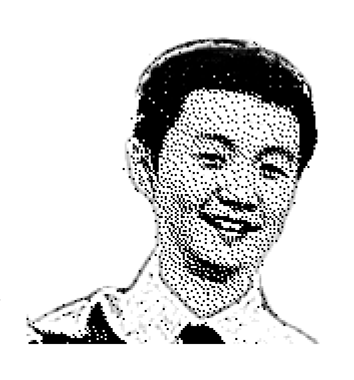
（杨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本文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原文链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08543）



【返回目录】



7-4 方可成：官员子女的求学路径



“不管具体的学校如何兴衰变迁，官员后代始终没有改变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这种追逐往往并不基于升学考试成绩的优胜，或机会均等的随机入学分配，而是与权力有关，尤以基础教育阶段为甚。”

新学年开学，优质学校的大门为谁而开，成为社会一大议论热点。

“在很大程度上，上好学校已经成为家长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的竞争。”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说。在“社会背景”的 PK 中，手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往往是优胜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短暂存在过一批为官员后代集中提供教育的“干部子弟学校”，但这种特殊的学校形式旋即就在 1955 年被通令取消，原因是与“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相抵触。

然而，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设置，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了干部子弟的教育“特权”。实际上，优质教育资源一直是权力寻租的重要对象。在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坊间依然流传着“某某学校是公认的高干子弟学校”之类的说法，而那些被提及的学校往往是同级别学校中的佼佼者。

从幼儿园到留学的子弟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的几年里，干部子弟大多遵循着一条明晰的求学路径——该上什么幼儿园，升哪所小学、中学，进哪所大学，乃至去哪里留学，都有着确定的选项。

这条轨迹的前半部分，由各种各样的干部子弟学校绘就。在官员扎堆的京城，这些学校包括：六一幼儿园、育才小学、育英学校、八一小学（今八一中学）、101 中学等等。

上述幼儿园和中小学均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老区迁入北京。按照“干部子弟学校模式”的提出者徐特立的想法，在战争年代创设这些学校是“为了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能解除后顾之忧，安心抗战救国，也为了把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遗孤培养成才”。

战争胜利后，这一模式被保留下来，包括毛泽东女儿李敏和李讷、侄子毛远新在内的核心领导人后代，亦在跟随父辈进京后就读于这些学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军区也纷纷创设自己的干部子弟学校，比如名字响亮的“北京小学”就是北京市委干部子弟学校。此外，“育才”、“育英”是这类学校的常用名，比如东北局和沈阳军区的东北育才小学，湖南省军区的育英学校。

此类学校大多聚集了大量名师等优质教育资源。中央政府发布的 1954-1955 学年度的统计数据就曾显示，干部子弟小学学生与员工的比例平均为 6：1，而一般大城市普通小学的比例为 28：1，农村小学为 35：1。

作为惟一一所由中共在老区创办并迁入北京的中学，101 中学的校友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曾山的儿子曾庆红、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等许多中共高干后代。

这所选址在圆明园遗址内的学校，从郭沫若作词的校歌中即可一窥特质：“我们是革命的儿女，我们从风暴中诞生，酝酿着优越的本领，锻炼着不屈的精神，要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要创造人类持久的和平。”

另一个足以证明其地位的细节是这所中学在 1952 年至 1982 年的校长——王一知。她是中共屈指可数的第一批女党员，是张太雷烈士的夫人。担任校长前，她的工资是行政 8 级，相当于副部长，而当时中学特级校长的工资也只能是行政 12 级。在王一知的多次要求下，她的工资也降为 12 级，一时传为佳话。

从中学毕业后，干部子弟们报考哪一所大学也基本上是确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校址在哈尔滨，简称“哈军工”。这所由陈赓大将创办于 1952 年的军工学校吸引着老干部和他们的后代，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增强了这种吸引力。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统计，导弹工程系和核物理系是干部子弟们最热门的去向。

“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老干部，焦急地盼望新中国有自己培养的军事科技干部，就像 1927 年盼望共产党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哈军工，掌握尖端的国防科技，实现富国强军的夙愿。”《哈军工传》作者滕叙兖这样解释干部子弟们的选择。



导致干部子弟云集哈军工的另一个原因是，从 1957 年开始这所学校实行保送招生，干部后代的政治条件占有绝对优势。在一段时间里，哈军工的干部子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父母亲属够不上副部级或少将以上的，都只能自视为普通学员。

还有一批干部子弟留学苏联，学习先进科技。早在东北全境解放前夕的 1948 年 9 月初，中共就曾派出 21 名年轻人留苏，当时的选拔标准是"军级以上烈士和干部子弟"，入选者包括叶挺之子、叶剑英之女等。

此番前奏之后，留苏于上世纪 50 年代常规化、制度化。1951 年，教育部发出《急速选拔留学生的指示》，要求选定"政治上可靠"的学生派往苏联。尽管后来留苏学生的背景渐趋多样化，但干部子弟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取消的和没有取消的

从 1955 年开始，干部子弟学校向其他家庭背景的学生敞开了大门。

这一政策的改变源于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对干部子弟特殊化的警惕。毛本人曾多次对子女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据官方史料记载，在干部子弟学校，有学生"不听老师的话，和老师顶嘴，甚至骂老师。有的学生还说：'反正老师不能开除我，我爸爸还管着学校哩！'"

1953 年，周恩来视察 101 中学时明确提出：干部子弟不能变成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两年后，所有干部子弟学校被通令逐步转型为普通中小学。中央政府直属的子弟学校纷纷划归地方。

101 中学也从中组部直属改为地方管理，同时，这所曾经只为红色贵族服务的学校也开始"掺沙子"。一开始，学校招收了不少周边北大、清华教授的子女，"高干"和"高知"学生们成了主要的家庭背景；1962 年，从郊县录取了一批学习成绩优秀的农民后代；1964 年，又招收了第一届"贫下中农子弟班"。

在教育学者杨东平看来，这一转型是打破"北京特殊论"的先例——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有一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因此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异常困难，但 1955 年的例子证明：取消优势阶层的特殊利益并非完全不可为。

但杨东平同时也指出，简单地取消干部子弟学校不可能真正消除由于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差异造成的教育不公。

事实正是如此。一方面，以哈军工为代表的学校在招生政策上有意向干部子弟倾斜；另一方面，排名靠前的学校录取过程中不乏走后门者。更有甚者，虽然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但一些学校将在校的干部子弟集中起来，组成“干部子弟班”。

李锐之女李南央曾回忆，当她 1963 年考入女十中时，就和其他干部后代一起被编入了干部子弟班，班主任由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亲自担任。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学生们普遍对俄语失去兴趣，但普通班依然以俄语为外语课内容，而干部子弟班则学英语。

进入初二后，李南央班上一位元帅的女儿转入了在女子中学中排行第一的师大女附中。“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似乎对军队干部的子女们是不适用的。”李南央回忆说。

随着政策的改变和资源的流动，101 中学等传统意义上的干部子弟学校已不再是唯一的宠儿，一些历史更为悠久的名校吸引了不少红色后代，女校即以师大女附中为代表，男校则以北京四中为典型。北大附中等 1960 年代新建的高校附属中学，由于调入了一大批大学老师前去任教，亦受到追捧。

景山学校则是一个年轻的特例。这所靠近紫禁城的学校创办于 1960 年，以教改实验为核心目标，实行中小学九年一贯制。由于当时教育工作由中宣部归口管理，这所学校的创办由中宣部主导，学校第一任校长是中宣部教育处干部方玄初，中宣部系统的干部子弟亦大量进入景山就读。

这所学校享有的资源亦少有能与之比肩者，首批中学特级教师即出自景山，遍布全国各地学校的标语“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则是邓小平为景山学校的题词——实际上，领导人参观和题词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衡量一所学校地位的重要标志。

兴衰变迁的和不变的

“文革”给教育界造成的混乱，令大量中小学重新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上，也令官员后代的求学选择有了新的变化。

在新一轮的赛跑中，101 中学已不再享有最高的地位，教育资源和生源亦随之流失。人大附中是新晋的黑马——学生高考成绩突出，频出状元，迅速成为京城名校，也成为干部子弟青睐的学校之一。

实际上，不管具体的学校如何兴衰变迁，官员后代始终没有改变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这是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普遍认可的事实。

这种追逐往往并不基于升学考试成绩的优胜，或机会均等的随机入学分配，而是与权力寻租有关，尤以基础教育阶段为甚。“条子生”和“共建生”即是最广为人知的寻租方式，前者通过领导干部给学校负责人“递条子”的形式为子女择校。南方周末记者从可靠渠道得知，一位退休领导人几年前曾经走访京城多所中学，最终为孙女选定了八中。

而“共建生”则是通过单位与学校达成“共建协议”的形式为本单位子女集体择校。起初，这样的“共建”不乏合理性。例如，外交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常年在外，需要委托一所学校集中管理他们的子女。然而，如今的共建已经多与利益有关。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促进义务教育教育均衡发展治理择校热的建议》中就指出：“重点学校与权势部门以‘共建’的名义招收‘共建生’，是权势部门典型的以权谋私的行为，也是择校生政策难以革除的重要原因。”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官员后代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已经相当多样和分散，并不囿于共建学校，也不囿于公立学校，甚至不再囿于中国学校。

北京一所私立学校的负责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透露：学生中有多位省级高官的孙辈，甚至有不少教育部官员的后代。“这些高官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北京任何一所学校去，但他们不认同读死书的教育模式，而是欣赏我们的理念，就愿意让孩子过来。我们的很多做法顺应了社会变化趋势，吸引了这些家长。”这所学校的负责人说。

中外合办的学校是官员后代的另一种选择。北京中加学校招生办樊主任说：学校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公务员家庭，家长中不乏高级官员。这类学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们为学生的出国留学铺就了一条良好的通道。

还有的官员后代则干脆就读于国际学校，这往往是由于他们出生在国外，具有外国国籍。

利益共同体

尽管今日的求学选择已经相当多样化，但北京四中、八中等传统名校依然保持了领先的地位，也依然聚集着不少官员子女。有观察者指出，这与学校获得的优惠政策及教育部门的巨大投入分不开，而这种优惠和投入又往往与就读于此的官员子女有关。

坊间曾流传一个段子：某位前任国家领导人的孙女在北海幼儿园上学，一天放学后，老师拍拍小丫头的衣服口袋："回家去跟爷爷说，你这里有一个条子。"而条子内容，则是称北京市对北海幼儿园的投资不够，要求得到更多的资源。

这个故事的真假无从查证，但其反映的现象真实存在。研究教育经济学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就指出：权力择校加剧了已经存在于同级学校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不均衡，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这种因子女教育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引起了许多人的警惕。"当前基础教育的阶层差距拉大，资源集中在优势阶层既得利益者手里，他们对重点学校的支持投资建设肯定不是为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杨东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而且，在集中优势资源之后，他们会担心少数重点学校的教育质量被稀释或降低，从而成为阻碍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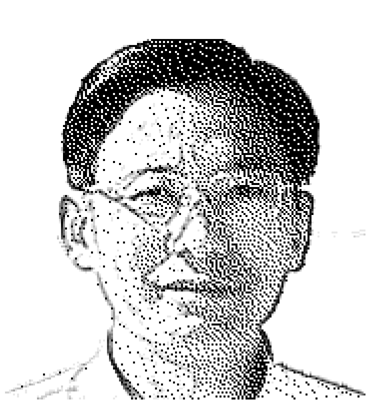
（方可成，南方周末记者。原文链接：http://www.fangkc.cn/2011/09/school-for-children-of-cadres/）

【返回目录】



【警】

7-5 储成仿：西耶斯的《论特权》及其历史启示



“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

在古今中外思想家当中，对特权有所论述的人不算很多，但也有那么几个。例如：英国思想家威廉·葛德文在他的《政治正义论》中对特权就有一些论述。他说：“特权是一种限制，它使少数人，而且只是这些少数人，由于他们的出生的偶然性而能够取得某种地位。它用一种显然无法逾越的障碍来扼杀其他人的一切雄心壮志。它向那特权阶级表明这个主要条件是绝对属于他们的，因而也削弱了这个阶级本身的抱负。特权使少数幸运儿独占大自然普遍赐给它一切子女的恩惠；它把压倒其他人的工具交到这些少数人的手里；它使他们充满虚荣并且给他们一切鼓励，使他们傲慢并对别人的感情和礼仪漠不关心”。（[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二、三卷，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4 月第 1 版，第 375 页）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戈德文对特权极其憎恨，所以，他在抨击和声讨特权及其产生的邪恶时用词十分锐利。

在我国著作家中，对特权论述比较杰出的，依我窄见，要数王亚南先生。王亚南先生在他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在论述官僚贵族化和门阀时说：最大官僚头目的帝王及其皇族，以及中上级的官僚们，他们在“法律上获得种种特权；他们享受高爵厚禄，做官发财，在本乡多购买土地，退休后就成了地方的豪绅，死后留给子孙福禄”。（王亚南：《中国官僚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6 月第 1 版，第 83 页）随后，在论述到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时，王亚南先生进一步指出：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王亚南：《中国官僚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90 页）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王亚南先生同样是憎恨特权的，只不过，作为一个中国著作家，其用词没有葛德文那么尖锐和激烈。



古今中外思想家对特权多有精彩之论，但依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我以为，在人类政治思想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位思想家能像法国思想家埃马努埃尔·约瑟夫·西耶斯那样，专门撰写出版了一个以《论特权》为名字的小册子，来论述特权。

那么，西耶斯何许人也？其小册子《论特权》是如何论述特权的呢？

根据《论特权》这个小册子的中译校者张芝联先生在他给《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法]西耶斯著：《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 1990 年 3 月第 1 版）这本书所作的序言里的介绍，西耶斯（1748—1836）生于一个税务官家庭，早年受耶稣会修道院教育，成为神甫，后来当过夏特尔大教堂议事司铎，享有教会领地。因缺乏宗教虔诚，对神学格格不入，从未履行神职，但他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兴趣浓厚，熟读洛克、马布利、孔迪雅克等哲学家的著作。1788—1789 年他连续发表四本小册子（《论特权》于 1788 年 11 月问世），猛烈抨击两个特权等级（教士、贵族），宣传政治制度改革，从此声名大振。

只要是读过西耶斯《论特权》的读者，我相信，都会感受到西耶斯《论特权》的主旨是论述和抨击特权的邪恶及其危害。

西耶斯在其《论特权》第一自然段里这样写道："有人说过，对于获得特权的人来说，特权是优免，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丧气。如果此话不错，那就得承认特权的发明乃是一种可悲的发明。让我们设想一个组织得尽善尽美，无比幸福的社会；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这点不是很明显吗？"（同上，第 1 页）。

从这段开篇之论里，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西耶斯对特权所持的态度是绝对否定的。以我的解读，这段文字的核心语句或核心判断是"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这句话。综观《论特权》全文，我们自然发现，西耶斯的整个论述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判断展开的，其论述之丰富、深刻、尖锐和精彩，可谓是登峰造极、鲜与伦比。

是的，"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在做出这个判断之后，西耶斯接着从特权的起源、本质和作用三个方面对这个判断给予了充分的阐述和论证。

1、特权的起源

西耶斯认为，特权的起源有两个，其一，“无论何种特权，其目的自然都在于免受法律的管束”；其二，“赋予法律所未禁止的某种事物以专属权利”。（同上，第1页）

首先，我们怎么理解“无论何种特权，其目的自然都在于免受法律的管束”呢？西耶斯从论述法律的目的切入，说：法律的目的“无疑是在于防止某人的自由或财产受到伤害”。因此，“不得伤害他人，这是一条母法，所有其他法律均当由此产生”。西耶斯在此不仅明确了法律的目的，而且还给划分好法律和坏法律立了标准或下了定义，他说：“能够阻止人们损害他人的法律必定是好法律；既不能直接地又不能间接地服务于这个目的的法律必定是坏法律；因为它们妨碍自由，并与真正良好的法律相对立”。（同上，第1—2页）

在论述了法律的目的以及什么是好法律和坏法律之后，西耶斯接着论述了自由与社会、自由与立法的关系。西耶斯说：“自由先于一切社会，先于所有立法者而存在”;“设置立法者的目的，不是为着给予我们权利，而是为着保护我们的权利。如果立法者限制我们的自由，那只能是针对可能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凡法律未予禁止的，均属公民自由的范围”。（同上，第2页）

基于以上论述，西耶斯彻底否定了特权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说：“那些以免受法律管束为目的的特权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已指出，所有法律都直接或间接地说：不得损害他人；而对特权者似乎是说：允许你们损害他人。没有任何权力机构得以做出这样的特许。如果法律是好的，人人都应遵守；如果法律是坏的，那就必须将它废除，因为它是对自由的侵害”。（同上，第2页）

其次，我们怎么理解特权另一起源是“赋予法律所未禁止的某种事物以专属权利”呢？对此西耶斯是这样论述的：“任何人也不应对未予禁止的事物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否则就是夺走公民们的一部分自由”。“凡法律未予禁止的都在公民自由的范围之内，都是属于大家的。让某一个人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人而损害大家。这种做法既表现了不公正的思想，又表现了最荒诞悖理的思想”。（同上，第2—3页）由此可见，西耶斯从特权产生的根源上彻底否定了特权存在的任何理由或依据。

2、特权的本质

什么是特权的本质？西耶斯说：“按照事物性质来说，所有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目的背道而驰”。西耶斯以“荣誉特权”为例，指出：“很难设想，人

们怎么能够同意为使三十万人得到可笑的荣誉而愿意这样侮辱二千五百七十万人”。（同上，第 3 页）

3、特权的作用

在分析了特权的起源和本质过后，西耶斯转向“考察它们的作用，既考察对公共利益的作用，也考察对拥有特权者本身利益的作用”。（同上，第 6 页）

实际上，西耶斯考察特权的作用也就是考察特权的邪恶和危害。从西耶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特权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危害：

第一，特权者只顾一己私利、不关心国家全民公共利益而致堕落。“当君主赋予一个公民以特权者的特征，从这时起，他便把这个公民的心灵引向一种个人利益，并且或多或少地使它对公共利益不再关心。对他来说，祖国的概念缩小了，祖国的概念只局限于接纳他的那个社会等级。他的一切努力，从前卓有成效地用来为全民事业服务，现在将转过来反对全民事业了。人们本想鼓励他做得更好，结果却使他堕落”。（同上，第 6 页）

第二，特权者拒绝平等、自视高人一等，特权阶级贪得无厌致使政治秩序混乱颠倒。西耶斯说：特权者的“心灵中产生了一种高人一等的要求，一种贪得无厌的统治欲望。这种欲望不幸与人类体质极为相似，乃是一种真正的反社会病，无人不曾千百次地感受到这种欲望的存在。如果说这种欲望因其本质而始终是有害的，那么，请大家判断一下，当它受到舆论和法律大力支持时，将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同上，第 6 页）

不仅如此，特权者还“自以为他和他同类的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等级，形成一个民族中的选民。他认为他首先对他的社会等级中的人负有义务。即使他继续关心其他人，这些人也不再是自己人，事实上不过是外人而已；再也不是他曾是其肢体的那个躯体，而只是老百姓，在他的言语及心灵中瞬即成为不值一文的人们，一个生来就为伺候人的阶级。而他则相反，生来就是为了治人，为了享受。是的，特权者确确实实竟然自视为另一类人”。（同上，第 6—7 页）这种“虚假的个人优越感对于特权者是如此珍贵，以至要把它扩大到他们与其他公民的一切关系中去。他们生来绝不与人混杂，与人平起平坐”。更有甚者，“特权者若是从他所蔑视的那个阶级遇到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不快，首先他发怒，他感到权利受到了伤害；他认为他的利益、他的财产也受到了伤害；他随即煽风点火，挑动他的所有特权同伙，最终组成一个可怕的联盟，

这个联盟准备不惜一切来维护日后扩大他的可憎的权利。政治秩序就是这样被颠倒了，只露出一个令人厌恶的贵族制”。（同上，第 7 页）

第三，特权是毒害社会的鸦片，它使许多人忘却和抛弃了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纽带而对特权趋之若鹜。西耶斯说：“为了解释人们何以如此炽烈地渴求获得特权，大家也许会想，至少一种牺牲公共幸福而有利于特权阶级的个人幸福已经形成，构成这种个人幸福的是一种优越地位的诱人魅力，享有这种优越地位的人为数极少，向往它的人为数众多，而其余的人迫于无奈便以种种嫉妒或仇恨的手段进行报复”（同上，第 8 页）西耶斯提醒人们：“让我们听听我们在这方面的亲身经历，看看所有大特权者、达官们的经历，在外省，他们因其等级而尽享所有优越地位带来的所有魅力”。（同上，第 9 页）为此，西耶斯感叹道：“啊！要是人们愿意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要是他们懂得为自己的幸福有所作为，那该有多好啊！如果他们同意睁眼看一看，这种残酷的轻率如何使他们长期以来蔑视自由公民的权利，去追求空虚的奴役特权，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公开放弃他们从小就受其熏陶的大量的虚荣！就会对那类与专制制度结合得如此紧密的事物秩序失去信任！公民权利包括一切；特权损害一切，而且丝毫也不能补偿”。（同上，第 9 页）

第四，世袭的特权比自己取得的特权害处更大。西耶斯说：“到目前为止，我把所有特权混在一起，没有区分世袭的特权与人们自己取得的特权；这并不是说，它们在社会中同样有害，同样危险。如果恶事与荒谬有先后次序的话，毫无疑问，世袭特权应该居首位，我不屑于废脑筋去证实一个如此明显的真理。把特权变成一种可以世代相传的财产，这就等于把为赋予特权强辩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借口也抛在一边了；这无异于丢弃一切原则，一切理性”。（同上，第 9 页）

第五，特权者用特权长期存在的传统事实迷惑民众，企图使民众相信特权等级源远流长，特权社会亘古不变。西耶斯说：“我们看到，在国民甚至还不曾想提出抗议的情况下，在我们眼皮底下出现了众多的特权者，他们带着宗教般的信仰，宣扬他们仅凭出身便有权获得荣誉，仅因生存便有权享受人民奉献中的一份”。（同上，第 10 页）然而，“实际上，特权者认为把自己看作是另一类人还不够。他们竟然谦虚地而且几乎是真诚地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裔都是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公职人员。以这样的身份，他们就好像是受公众委托的全体代表，不管他们来自哪个阶级。正由于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他们才自以为对生活在君主制下的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在通政府首脑或同君主本人讲话时，他们就以王位的支持者和国王的天然捍卫者的身份出现，反对人民；反之，在同国民讲话时，他们就一变而为人民的真正保卫者，仿佛人民没有他们，就会马上被专制制度碾得粉碎”。（同上，第 10 页）所以，“正是通过混淆这





些简单的概念，特权阶级侈谈什么必须建立隶属关系。有人想用武士精神来评论民事关系，结果把国家仅视若一个庞大的兵营。在一本新出的小册子里，有人竟敢把军官与士兵比作特权者与非特权者！武士精神与僧侣精神有密切关系，如果你们征询有僧侣精神的人，他也会回答：要使一个国家秩序井然，只有将它置于统治着无数受难者的那些规章之下才行”。（同上，第 11 页）由此可见，特权阶级为自己“合理”存续编制的借口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第六，特权阶级贪图金钱，敛财手段卑鄙龌龊。西耶斯说：“至于金钱，特权阶级确实应该强烈地感到有此需要。他们甚至比别人更倾向于放纵这种强烈的贪得欲望，因为他们的优越地位带来的偏见不断地怂恿他们挥金如土，而且因为当他们放纵贪得的欲望时，不必像其他人那样顾虑失去任何荣誉、任何尊敬”。（同上，第 12—13 页）

西耶斯接着论述道：“既然特权者比别人更为贪财，那么他们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来满足这种贪欲呢？不外乎阴谋与乞讨。这两种行当变成了这个公民阶级的特殊行业。由于只操此业，所以他们精通此道；凡是这两种才干能获得硕果的地方，他们便侧身其中，排除来自非特权等级的一切竞争”。（同上，第 13 页）

为了获取金钱，“他们充斥宫廷，包围大臣，独占所有的恩赐、所有的年金、所有的带薪职称。阴谋把目光普遍地投向教会、司法界和军界。它瞥见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或是一种可捞到这笔收入的权力，这种权力与无数的职位相联，而过不多久，它终于把这些职位看成金钱职务，设置这些职位不是为了完成应由才干之士来完成的职能，而是为了确保与特权家庭相符的境况”。（同上，第 13 页）

极为有害的是，“他们并不因自己的阴谋伎俩娴熟老练而高枕无忧。由于他们担心，在某些短暂的时刻，大臣会因想到公众利益而一时清醒，所以他们及时利用某些行政官员的无能或背叛。他们终于通过一些手续完备的法令或一套相当于专属法的行政制度，使他们的垄断得到认可”。（同上，第 13 页）

更为糟糕的是，特权阶级“使政府屈从于那些对整个国家经济破坏性最大的原则。尽管国家经济要求在各个方面都任用最能干、最便宜的公仆，垄断却强行选择最昂贵因而最低能的公仆，因为垄断的明显作用在于制止那些在自由竞争中本来能够显示才能的人有所发展”。（同上，第 14 页）

论说至此，让我们再回到西耶斯《论特权》开篇所说的那段话，我们发现，西耶斯对特权的性质以及危害的论述是多么的切中要害而又鞭辟入里啊！读完《论特权》全文之后，掩卷而思，我不禁发问：西耶斯发表于 200 多年前的《论特权》这个小册子给了我什么历史启示呢？



或者说，读过西耶斯的《论特权》过后，我会得出什么基本结论或作出什么基本判断呢？以我肤浅的解读和概括能力，我以为，西耶斯的《论特权》给予我的历史启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和表达，就是：特权是搞乱社会的一大祸害！这也是我读过西耶斯《论特权》之后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或做出的基本判断。这个基本结论或基本判断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已经被在其发表过后不到一年就发生了的法国大革命所证实了的！历史已经昭示：特权引起的腐败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面对当今社会，特权仍然汹汹，动乱几乎连连！试问：若要求得社会安定，除了根绝特权、釜底抽薪，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可以去选择呢？！

（储成仿，学者。本文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原文链接：

http://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6690）

【返回目录】



【镜】

7-6 戴隆斌：苏联解体是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



“尽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关键原因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种结果也是苏联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

苏联解体已近 20 年，但对解体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们看来，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原因也有主次之分。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还是出自苏联执政党自身，而其中苏联长期存在的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职务名册”与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

苏联特权阶层是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相应地掌握着国家执政资源并且按职级合法享受不同特权的一部分人。这个特权阶层，俄语中是用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这个词来表示的。从字面上来说，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nomen”，意思是人名名单或者品名清单。借用到俄语中，这个词指的就是职务名册，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讲，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后来这一制度涵盖了对苏联领导干部的考察、登记造册、任免以及职级待遇等方方面面。

作为公职人员任命原则的“职务名册”制度，在十月革命之后就开始实行，只是最初还没有规定这一原则的指令性文件。1923 年 6 月 12 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同年 10 月，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登记分配工作基本任务的决议。1925 年 11 月 16 日，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条例，同时通过了一份重新修订的“职务名册”。“职务名册”各种各样，当时最重要的有 3 号：第 1 号“职务名册”是由中央

委员会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第 2 号“职务名册”是中央组织分配部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各部委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称为第 3 号“职务名册”。其他则是地方各级机关的“职务名册”。

“职务名册”制度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最终定型。此后，尽管“职务名册”制度作了一些修订，但是基本原则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深入，“职务名册”制度也开始被触动。1989 年 10 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终止执行有关干部任用的《职务名册登记监督》的决议，“职务名册”制度代之以选举制，从此“职务名册”制度作为一种干部任用制度在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1991 年“8·19 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于 8 月 23 日宣布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职务名册”制度被彻底取消。

通过“职务名册”制度获得任命的这一部分干部，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享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和一定的特权，有着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垄断了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管理，代表了苏联的官僚集团，也就是整个党和国家权力阶层。苏联由此产生了一批封闭的特权阶层。

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可以说，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与发展是与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权力逐渐集中相一致的，它的形成与确立又是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确立同步的。实际上，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因此，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不仅与“职务名册”制度相联系，而且和斯大林模式有共性的内容。

1.权力结构呈现金字塔形，其权力具有专断性。

上至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组织局，下到各县、区、镇，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组成人数是逐渐增多的。按照“职务名册”规则，各级官员是任命的，其命运掌握在最高领导层手中。

在斯大林时期，处在最上面的当然是"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斯大林，大部分官员的任用是由斯大林亲信控制的组织分配部决定的。斯大林本人控制着第 1 号和第 2 号名单，甚至经常操纵第 3 号名单。此外，中央书记处一方面给各省书记处推荐候选人，另一方面还给中央组织局（可以作出党和国家最高职位任命决议）推荐候选人。这样，以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就掌握了全国各级主要领导人的任命权。与此同时，无论是党内还是苏维埃，都缺乏对这个阶层的监督制约机制，致使这个阶层制定政策时独断，实行政策时武断。

2.权利的特殊性。

根据"职务名册"任命的各级干部享有与众不同的各种特权：高级住宅、别墅、汽车、休假券及休假旅费、"医疗费"补助、在特供商店购买紧缺品等。

另外，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起，还实行了领导干部高薪制，除正式工资外还要发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即所谓"钱袋"制度。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不等，数量的多少取决于职位的高低。

赫鲁晓夫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官僚的很多特权，他的改革遭到了特权阶层的激烈反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还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这就促使苏联的特权统治阶级迅速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时期，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 30~44 倍。

3. 官位某种程度的凝固性和继承制。

官位的凝固性表现在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斯大林时期，干部不仅层层由上级任命，而且实际上是终身任职。赫鲁晓夫对干部制度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不断更新的制度，并把干部更新制度写入苏共纲领和章程。这种干部更新制度严重触动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特别是高层的强烈反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并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全面否定了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 1/4 成员的做法。

官位的继承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务名册"制度官员本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特定阶层，他们官官相护，互相推荐任用，代代相传；二是官位的直接继承，如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 25 岁就当了将军，这样的例子很多。

4. 干部队伍的保守性。

苏联在选拔任用干部时的标准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忠诚，但在实际操作中，业务素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素质"，另一个重要标准是对领袖是否效忠。如，联共（布）十七大后，对斯大林崇拜与否成了一条政治准则，吸收党员、职务升降、"派别活动"的划分、"人民公敌"的定案等等，一概以此为界。尽管有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苏维埃国家十分忠诚，但只是在领袖崇拜上稍有微词，就立即被降职、免职，甚至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死于非命。而那些把斯大林称为"伟大的领袖和天才导师"、"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等等的人却飞黄腾达。在决定干部任用时采用暗箱操作方式，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到该人的工作能力。这实际上使得苏共形成了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这种政策不可能产生选拔优秀人才的机制，相反，却把许多有文化的、才华横溢的人才排斥在干部队伍的大门之外。通过暗箱选拔出来的干部，不仅只是一味地忠实执行上级的指示，缺乏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还会把一些有改革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干部视为"另类"，使他们无法在负责的岗位上继续工作下去。苏联仅有的几次改革无果而终，改革失败后的体制越发陷入僵化。领导干部为守住既得利益，求稳怕变、故步自封，与快速发展的外部世界隔绝，错过了改革发展的有利时机，致使整个社会处于全面病态中。

苏联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苏联特权阶层的存在和发展，对苏联剧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苏联特权阶层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

"职务名册"制度的核心就是任命制。由于在干部任用时完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暗箱操作，任用的标准主要又是对领袖的忠诚与否，因此，这种制度酿成了苏联政坛上的阿谀逢迎之风。这种风气极大地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盛行，最终导致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极不正常的个人高度集权现象。正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使苏联的决策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失误，包括严重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第二，特权阶层拥有的特权恶化了党群关系，加大了与普通群众之间的隔阂。

如前所述，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特权。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隔阂。他们表面上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公仆"，实际上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各种特殊待遇，甚至腐化堕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谅解的。

当各种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从而对苏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对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怀疑。

第三，苏联剧变是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

尽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关键原因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种结果也是苏联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苏联的特权阶层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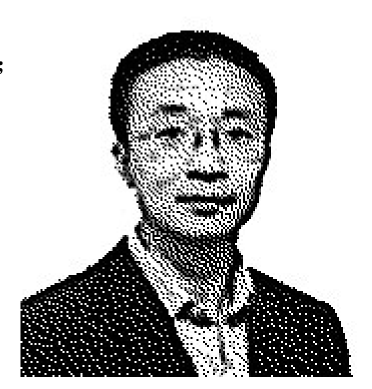
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苏联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他们趁着戈尔巴乔夫刮起的改革之风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据为己有。尤其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戴隆斌，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5066)

【返回目录】



7-7 郑连根：特权阶层是怎样搞垮汉朝的



"一个王朝，上层有外戚和宦官两个"权力偏房"忙于争风吃醋；下层的官僚体系忙于逢迎巴结、非法敛财，他们合力埋葬了一个曾经强盛的王朝——汉朝。"

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带给后世足够的荣耀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人格和政治路径。与此同时，汉朝衰落的历史原因也足以警示后人。

诸葛亮有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用现代眼光看，诸葛亮所说的"小人"，其实就是特权阶层，具体说就是外戚、宦官和腐败官僚。汉朝的最后垮掉，就是因为这些特权阶层一步步霸占了社会资源，并最终绑架了政权。

先说外戚。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之后，大封同姓王和功臣，"非刘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外姓篡夺刘家的天下。可惜，历史还是跟刘邦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去世之后，吕后控制了朝政，揭开了外戚擅权的序幕，此后，外戚就一直是汉朝的"权力偏房"。外戚控制朝政的最大弊端就是任人唯亲和飞扬跋扈，著名的吕后自不用说——她一面诛杀功臣和刘氏宗亲，一面安排娘家人掌权，"秉政前后二十年"的霍光也毫不逊色，他的儿子、侄子、女婿及其他亲属位居高官，权倾朝野。汉宣帝在与霍光同乘一辆车时都感到"若有芒刺在背"，因为他知道，连自己的皇位都是霍光给的，若得罪了霍光，就可能被废掉。外戚王氏家族掌权之时，家族里面共出过十个侯，五位大司马，朝廷其他要员的任免均须得到王太后和大司马的认可。王氏家族长期专权的结果是彻底绑架了国家，操纵了国家机器，最终导致王莽篡权，西汉终结。

到了东汉，外戚变得更有势力。与西汉相比，东汉时的皇后多出身豪门，光武朝郭皇后的母舅就"拥众十万"。这些家族原本就有势力，成为外戚之后，权势自然更大。据史料记载，顺帝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冀飞扬跋扈，强掠良人为奴、侵夺他人土



地、藏匿朝廷逃犯等，百官对其只敢逢迎，不敢违逆。他们上下其手，黑白通吃，把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搞得乌烟瘴气。

再说宦官。西汉时期，宦官专权还不是很严重。到了东汉，光武帝进行"行政改革"，所有的宫廷职务都由宦官充任，宦官势力从此逐步坐大。外戚梁冀过于嚣张，汉桓帝忍无可忍，最后与五个太监合谋发动政变，铲除了梁氏。这本是件好事，可这五个太监因功封侯，取梁氏而代之。太监擅权虽招致外戚和官僚集团的联合反对，但太监是皇帝、太后的"身边人"，这种亲近关系使他们能方便地影响皇帝和太后。更关键的是，太监专权后能轻易把持朝廷的奏章，使得外戚和朝廷官员失去申辩的机会。所以，在此后的桓、灵二帝时期，东汉的大权就一直由宦官掌握，直到最后引发了董卓之乱。

宦官虽无子女，但他们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多有豪族支持，而且他们可以收养儿子，爵位可以传承下去。在顺帝、桓帝和灵帝时期，许多宦官的养子、兄弟、叔伯、侄子都当上了高官。这些人鱼肉地方、横行霸道，少数有良知的官员出面弹劾、惩罚他们，通常都会招致诬陷、罢免甚至杀戮。正气不张，邪气太旺，这样的政权如何能够长久？

再看官僚体系。若大多数官员贪污腐化、营私舞弊，那么官僚体系本身就会严重妨碍社会的正常运转。汉朝官员的俸禄是很高的，因级别不同，实际年薪从禄米 4200 石到 192 石不等。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按战国时李悝的算法："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也就是说，五口之家的农户一年的全部收入约为 150 石。可见，汉朝最高级别官员的年薪几乎是普通农民家庭全年总收入的 30 倍，最低级别官员的年薪也比普通农民一家的年收入要高。按说，这样的高薪足以"养廉"了，可事实上，官员们还是想尽办法增加自己的家产。杨敞做过大司农和丞相，他死后留给儿子杨恽的财产是五百万，留给自己第二任妻子的财产还有"数百万"。丞相张禹的家产更达到八亿，"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膏腴上贾"；御史大夫杜周"家资累巨万"；灌夫曾为淮阳太守，横行颍川，"家累千金"。

除了疯狂敛财之外，官员们还把持着官场"准入证"。汉朝选拔官员实行察举制，这理应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制度，实际上却成了官员间拉帮结派、谋求私利的工具。他们互相推荐子弟、亲信当官，一步步将政治资源私人化、板结化，不仅极大地堵塞了下层民众的上升渠道，而且造成了官官相护的坏风气。

总之，作为特权阶层的官僚体系在汉朝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笔"负资产"，是啃噬人民的寄生虫。普通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最后只好寻求"非法救济"——求游侠出面主持公道。游侠确实有"侠"的一面，但更多时候是一种破坏力量。在行侠仗义的同时，他们也杀人越



货、强取豪夺。更重要的是，一个可以号令徒众的游侠经常会成为武装组织的头领，公然挑战政府和法律的权威。不少游侠后来就成了东汉末年军阀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李通，他“以侠闻于江、汝之间”，最后率领两千余家部众投奔了曹操，拜振威中郎将。东吴名将甘宁，原本也是游侠，曾“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这样的游侠其实跟今人所说的黑社会毫无二致。

一个王朝，上层有外戚和宦官两个“权力偏房”忙于争风吃醋；下层的官僚体系忙于逢迎巴结、非法敛财，他们合力埋葬了一个曾经强盛的王朝——汉朝。

特权阶层最大的害处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奢靡和跋扈，还在于他们挡了好人（比如诸葛亮所说的“贤臣”）的路，他们的坏是双重的——屏蔽了社会良性发展的可能，使国家丧失了宝贵的机会。特权阶层谋求保住特权或扩张特权之日，往往就是公平和正义遭受戕害之时。

（郑连根，济南时报编辑。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 年第 9 期。原文链接：http://news.qq.com/a/20100920/000867.htm）

【返回目录】

【FMN Newsroom：一周新闻综述】

1、本周中国法律案件

因刺死城管一案被判处死刑而引起关注的小贩夏俊峰，他的妻子张晶 9 月 11 日在微博上表示一直以来接受社会援助的银行账户，在未得到通知的情况下自 9 月 2 日起便被冻结。卡中的 4 万多元的一多半是好心人购买他们的儿子强强画作的善款。
新闻：http://cn.fmnnow.com/?p=297

河北保定 9 月 8 日连夜审判“王朝抢劫案”，并认定王朝抢劫罪成立，获刑 13 年。9 月 11 日此案审判长接受访问回应社会质疑，尤其他提到存在瑕疵的证据在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可被采信，引起法学专家的不同看法。
新闻：http://fmn.cc/qejnEf

1995 年河北青年聂树斌因奸杀一康姓女工而被判处死刑，2005 年河北省抓获一逃犯王书金供认该起案件他才是真凶，聂树斌被冤杀一事浮出水面。但时隔 6 年，此案未处任何结论和说法，因此数十位法律专家学者联名上书督促法院再审。新闻：http://fmn.cc/o708vx

广东省乐昌一名 14 岁男孩被法院认定为一“非法组织”的老大而获刑 3 年半，但据记者调查，该男孩并未参与斗殴事件，也未加入该“非法组织”QQ 群，且事发当天询问笔录中也未显示案件同该男孩有关，但一周后涉案人员却统一口径称男孩为指挥者，不禁引人质疑。
新闻：http://fmn.cc/of6CXK

自从刑事诉讼法草案 8 月公布向社会征集意见以来便争议不断，近日有侦查机关对新增的“沉默权”反应强烈，认为法规超前，难以驾驭和执行，对惩治犯罪将造成妨碍。法律人士则认为该条款有助于保障人权。
新闻：http://fmn.cc/ql7JXS

2、夏季达沃斯大连开幕

温家宝 9 月 14 日出席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经济论坛并致辞，他在讲话中提到改善教育、共同富裕等方面，尤其提到“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他的讲话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在随后的交流中他还表示将援助处于经济衰退中的欧洲。
新闻：http://fmn.cc/p3FTy4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坐经济舱是政府官员的一般规则，对媒体的关注他也感到意外，并表示自己“真正代表了美国人的真实做法”。14 日该条新闻成为了网络上人们关注的焦点。
新闻：http://fmn.cc/r0gFE2



3、湖南邵阳沉船事件

湖南省邵阳县 9 月 9 日下午一艘超载的客船挂断滞留在河边的挖沙船钢丝绳，造成客船侧翻下沉。截至 11 日该起翻船事故已造成当地 12 人遇难，但官方公布的乘客和遇难人数同民间说法存在出入，引起了多日的猜测和记者的求证。
新闻：http://fmn.cc/nCPJwW

9 日的事故发生后湖南邵阳副县长被免职，事故中遇难者的名单被公布，官方的赔偿方案也从 14 万元涨至 20 万元，但有记者调查到，10 日凌晨当地开闸放水造成河水猛涨，此举动引发了冲走遇难者尸体的猜测，14 日官方称涨水是上游降雨所致。
新闻：http://fmn.cc/ooQ1RT

网络上 11 日曝光了一份 13 岁遇难女生银美的沉船事故的赔偿协议，协议中要求家属签订后同意政府对遗体火化，并由家属在三日内完成善后工作，费用自理，还包括拿到全额赔偿 20 万后不提出新的要求，不上访，不闹事。
新闻：http://fmn.cc/nLpwIK

湖南省邵阳县的沉船事故因遇难者名单的难产引起了民众的关注，由于客船是被挖沙船的钢绳绊住导致沉船，且有消息指出该县水利某官员参股挖沙，当地政府表示会严查此事。目前已公布的 12 名遇难者的家属均已签订了 20 万元的赔偿协议。
新闻：http://fmn.cc/q3KncV

4、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

9 月 6 日晚间网络上有消息称，属于北京高级住宅区的西山华府有 2 名分别开着宝马和奥迪的车主暴打小区内的一对夫妇，宝马车前挡风玻璃上有人民大会堂准入证且车内有一把冲锋枪，打人者还高喊“谁敢打 110”。随后有消息显示打人者分别为山西省高官及一李姓歌唱家之子，但 7 日晚山西国税局发声明否认同车主有关。
新闻：http://cn.fmnnow.com/?p=226 、http://fmn.cc/roI1OT

网络疯传的 9 月 6 日晚北京西山华府小区的打人事件已经查明，其中无照宝马车主是中国军人歌唱家李双江的 15 岁儿子，另一奥迪车主是一名苏姓的高三学生，且晋 O 车牌为套牌车。由于打人者的嚣张态度以及有“背景”的真实身份，此事自曝光以来受到了持续的关注。
新闻：http://fmn.cc/oA9mx5

自从 8 日媒体曝出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后，当日李双江即到伤者所在医院看望，并鞠躬道歉，对于如何处理打人者的责任，伤者的态度变得模棱两可。而多家记者采访时遭到了不礼貌的对待，不仅被没收采访证还受到威胁。李双江则回应称以他的级别配警备员是正常的。
新闻：http://fmn.cc/quztPj

9 月 14 日晚间传来消息，打人事件中受伤夫妇与李、苏二人家长会面，双方达成和解。夫妇



二人称已接受两个孩子家长的道歉，将不再对此事进行追究，并希望今后能对孩子严加管教。
新闻：http://fmn.cc/pwGt0h

5、其他重点新闻

9 月 8 日广州市各区县进行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许多独立参选人在网络上对投票、计票过程进行了直播，让广大网友知晓了选举情况，虽然最后结果并未有独立参选人当选，但他们仍获得了不少支持。
新闻：http://cn.fmnnow.com/?p=289

备受瞩目的中国人权活动家王荔蕻“寻衅滋事”案 9 月 9 日上午在北京温榆河法院宣判，最后法院判决王荔蕻罪名成立，判处 9 个月有期徒刑，她的家属、律师均表示王荔蕻无罪并提出上诉，按照刑期计算王荔蕻将在今年 12 月份被中国当局释放。
新闻：http://cn.fmnnow.com/?p=285

9 月 12 日，中国终于发表声明承认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为利比亚执政当局和利比亚人民的代表，通报了中方对其承认的决定。并表示：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高度重视“过渡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一直同其保持密切接触和联系。
新闻：http://fmn.cc/r13f08

中国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在一论坛上称“管不了五亿网民”，来回应中国对网络管理过严的批评。但同时他又认为，网络发展必须有秩序和安全。被外界认为中国欲通过新的立法措施来限制网络自由。
新闻：http://fmn.cc/qC9Mcl

来自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一份对广深高铁的检测报告显示，广深高铁复测出 57 处问题，其中多处问题跟信号有关。此前有负责人表示广深线会在大运会前通车，而 7·23 动车事故后，各地铁路开展检查，有高铁专家组成员表示高铁项目都存在着盲目缩短调试期的现象。
新闻：http://fmn.cc/navJrM

有报道称近日公安部联合多地公安部门捣毁了一条制售地沟油充当食用油的产业链，警方称此案涉及地沟油从炼制到收购，再到销售，直到流向人们餐桌几个过程，但网友表示该现象已存在多年，称因此案证实地沟油走向餐桌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新闻：http://fmn.cc/nE6HBJ

引发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郭美美不仅出单曲、代言，近日还接连接受 2 家媒体的专访，大谈出名后的心路历程、父母的财政状况和炫富为自己带来的种种改变。2 篇报道引发的不仅是网友的关注，还有媒体界有关道德底线问题的口水仗。
新闻：http://fmn.cc/ru34p4 、http://fmn.cc/qkIAOq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二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論壇（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

编辑：方可成 姚梧雨童
校订：丁昕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王琳
技术支持：毛向辉 舒欣
出品人：杜婷

